

论容闳与旧中国的近代化^①

郭 吾 真

一

容闳(1828—1912)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创始人。^② 1854年,他以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身份,离美回国,怀抱“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爱国主义理想,开始了摸索前进的复杂生涯。他笃信基督教,当过洋人的译员和采购,为洋务运动效过劳,接受过清王朝的官职,戊戌变法时期,才以其改良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出现于历史舞台,庚子“自立”运动失败,^③成为被通缉的政治犯,最后以辛亥革命同路人的面貌,^④客死海外。

容闳的思想体系,始终未能突破改良主义境界。而清末中国的一切近代化事业,却都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洋务派和改良派办过的种种“新政”中,几乎都注有他作为一个“设计师”的心血。而在他的一切“设计”中,又都显现着高度的完整性与针对性。所以,就当时来说,他无愧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⑤ 列宁还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⑥ 遵照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原则,考察容闳在争取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会有助于进一步荡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流毒。

二

容闳的青少年时代,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渡过的。那

①本文主要依据容闳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译本《西学东渐记》(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写成,文中凡不注出处的引文,均见原书。

②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312页。

③1900年,改良主义激进派唐才常等发起反清“自立”运动,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容闳被拥为会长。运动为张之洞血腥镇压,唐才常等志士牺牲。

④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曾得到容闳的同情和鼓励。1903年洪全福等计划的广州起义,决定胜利后当举容闳为临时政府大总统。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又特邀容闳回国,共襄国事,未果。

⑤《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⑥《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是一个历史大动荡的时期。他出身贫寒，家乡澳门，是鸦片战争前殖民主义冒险家在中国唯一可以自由出入的“乐园”。^①这决定了他连续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薰陶的命运，促进了他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他的生活环境、意识形态，使他同那些由地主阶级或买办商人转化而成的改良派之间，出现若干分歧。后者基本上都是在外国侵略的直接刺激下，接受了林则徐带头“开眼看世界”^②和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③观点的影响，产生了向西方学习、改变中国落后状态、从而抵制西方侵略这种进步思想的。他们都拖着一条或长或短的封建主义尾巴，不能违背传统的圣道或伦常，也不能轻易改变仇视人民群众的正统主义立场。容闳则不然。他从未反对人民革命的言或行，反映了他改良主义思想中突出的人民性。

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已挟其鸦片、宗教、商品和炮舰四管齐下的殖民主义政策，多次向中国实行疯狂的冲击。澳门由于长期为葡萄牙殖民者盘踞，清政府无力控制，早成为西方各国侵略者进攻中国的桥头堡。鸦片流毒和传教活动，是它们荼毒中国人民的武器。澳门一带居民，面临严酷的考验。是接受鸦片的毒害？还是接受宗教的麻痹？几乎可以说，二者必选其一，别的抉择是很少的。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容闳选择了后一条路。不过他虽然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却从未被麻痹到丧失理智，没有出卖灵魂。这已由他一生的实践所证明。

容闳的选择，却也很适应西方侵略者的需要。因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实行的、包括传教的各种文化侵略，目的都“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中国人民”。^④因此，早在1834年，英国教会已在澳门开办学校，吸收中国穷苦儿童。第二年，容闳开始在该校接受启蒙教育。1839年，英国为纪念第一个来华传教有功的教士玛礼孙^⑤，以该校为基础，开办了正规的初级学校——玛礼孙学校。1842年，学校迁移香港。香港这块神圣的中国土地，自此随着主权的丧失，^⑥成为西方国家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学校负责人是美籍传教士勃朗。可见玛礼孙学校，实际是英、美狼狈为奸，共同实行宗教侵华政策的阵地。不仅容闳继续在此读书，连他寡母的生活费用，也长期由教会所负担。教会之所以肯作如此慷慨的“慈善”施舍，当然是为了换取容闳终身充当教会工具、献身传教活动、以达其麻痹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

1846年，容闳在玛礼孙学校毕业。为了深造，他偕同黄宽、黄胜两同学，跟随勃

①澳门于1593年为葡萄牙殖民者所霸占，逐渐成为西方各国侵略者麋集的特殊地带。

②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1页。

③魏源《海国图志·序》。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⑤玛礼孙于1807年由伦敦布道会派来广州传教，1819年将基督教《圣经》译成中文，基督教影响，自此扩散在中国各地。玛礼孙成为执行英、美宗教侵华政策的开路人。

⑥根据中国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所规定，清政府“割让”香港给英国。

朗，赴美留学，揭开了近代中国教育史上青年学生泛海求学的新篇章。这件事，同清政府原无任何关系，却同旧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个青年都一贫如洗。他们的学费与生活费，全靠教会津贴和勤工俭学的收入所支付。值得赞扬的是，他们都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操，没有成为教会的俘虏。他们先入麻萨诸塞州的孟松中学学习，过着质朴勤奋的苦学生生活。黄胜因病，中途辍学回国。1850年，容闳、黄宽毕业于孟松中学。黄宽去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学医，1857年毕业归国，成为中国最早享有盛名的西医，1879年在广州逝世。^①容闳留在美国，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位当时东方唯一的美国大学毕业生，去国八年之后，满怀改造中国的热望，回到了祖国。

容闳在美国留学的八年，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和清政府逐步对外屈服的八年，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风暴日益增强的八年。^②俗习所谓的“内忧外患”，迫使许多爱国士大夫抛弃了“无实无用”^③的考据、词章等旧学，纷纷走上钻研经世致用或格致之学，谋求抵抗侵略的道路，促成改良主义思想的初步发展。容闳久已蕴蓄的救国理想，也在时代激流的冲激下，趋于具体化。清统治的腐败，是促成他献身于祖国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原因。他在大学肄业时，已深思熟虑：“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使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竞吾素志”，即要用“西学”导致中国“文明富强”，达成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爱国主义理想。因此，当孟松中学要求他以将来终身在中国传教为条件，保证资助他读大学时，他严正地加以拒绝了。他表示决不能将“有用之身”，置于“无用”之地。他宁肯忍受劳苦、不肯出卖灵魂的高尚品德，使美国教会大为震惊，而无可奈何。他终于靠勤工俭学和一些无条件的资助，顺利完成了全部学业。

容闳的爱国主义责任感，使他大学毕业时已做出维新中国之种种设想。他后来追忆当时的心情说，自己“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求学之志，……则当旦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正是这种责任感，驱使他归国后毅然投身于改造祖国的种种尝试中。

四

容闳在国内并无显赫的社会关系。如何实现改良祖国的抱负，他完全心中无数。回国以后的八年间，他一直在暗中摸索，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1855年，他一入国门，就接触到两广总督叶名琛残杀广州无辜百姓七万余人的血腥罪恶现实^④。那种“流血成渠”，“横尸遍野”的恐怖阴森景象，激起他无比的义愤，

①参阅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资料）第8册，第423页。

②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革命风暴不久就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③严复语，见《救亡决论》。

④见容闳的《教育计划》，按即叶名琛镇压天地会起义事件。

使他“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他甚至一度产生“欲起而为之（指太平革命）响应”的念头。这是一般改良主义者难以达到的思想境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当然不可能投身农民革命的洪流，何况他始终有一种想“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余志”的成见，对革命的同情与向往只能停留在思想情感上。但是，这同仇视革命的其他改良派相比，毕竟有高山深渊之别，不能不使人敬佩。

他在摸索改良祖国道路的八年间，遭受过说不尽的屈辱与失业辛酸，但始终保持着他的民族自尊心和争取祖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崇高志向。最值得赞扬的，是他对太平天国首都的访问及其向革命者所上《富强策》。

1860年11月，容闳利用为英商采购丝、茶的机会，到南京进行访问。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是他在香港结识的好友。他们的真挚友谊，助成他在南京历时一个多月的盘桓。容闳深深为革命者的盛情款待所感动，加之以他从上海到南京沿途的冷静观察，深刻地认识到各处的“荒芜”和悲惨现象，都是“官军”烧杀掳掠的结果，而太平军辖区，则处处“商不辍业，农不辍耕”，一派繁荣景象。李秀成在苏州地区所执行的保护生产力的政策，尤其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反革命分子诬蔑革命的种种澜言，都被他唾弃。他自此不自觉地充当了太平革命的义务宣传员，而且还产生过依靠太平天国推行他争取中国近代化计划的愿望。因此，他慨然向天国领导提出了一个《富强策》，幻想中国及时走上文明富强的资本主义道路。

容闳的《富强策》，是一个导致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改良主义方案。它以培养人才为核心，包括组织一支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有学识的军官，建立海军学校，建设良好政府，创立银行制度及制定度量衡标准，颁布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和设立各种实业学校等七项内容，是一个全面改革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的资本主义建设纲领。其中除第六项建议“以耶稣教圣经列为（学校）主课”，毫无可取之外，全部计划都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同当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破土欲出的趋势，颇相适应。它与洪仁玕所拟的《资政新篇》具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容闳渴望他的方案被采纳，及时付诸实施。他很愿以一名“马前卒”的身份，助成其事，以遂他“维新中国”的宿愿。

容闳把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革命者方面。然而当时革命已处于困难阶段，对敌武装斗争成为高于一切的当务之急，致使《富强策》和《资政新篇》的命运一样，不得被置于次要地位。革命者对容闳其人，却备极欢迎与信任，赠他以“义”^①的光荣职称，恳请他留下来，为革命效力。但由于《富强策》的实施希望渺茫，容闳嗒然若失，也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对革命的前途产生怀疑，致使他辜负了革命者的信赖，决然离去。而他的《富强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面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施政纲领，因其基本上概括了后来改良派的全部要求，起了椎轮大辂的作用，却使他这位改良主义创始人的远见卓识，永垂青史。

① “义”是太平天国官制中仅次于王、侯、将的第四等爵位。

1863年,容闳在欲识“达官”行其志思想的支配下,通过当时杰出科技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①等友好的推荐,开始同洋务派大头目曾国藩建立了关系,参加了洋务运动。他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一个途径,所以自此忠实地为洋务派效劳达二、三十年之久。洋务派所办“自强”、“求富”那些自欺欺人的所谓“同光新政”,容闳几乎都为之呕心沥血,贡献了聪明才智。他满以为渴望已久的“新形势”,可以由此变成现实,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可一变而为文明富强的独立的资本主义新中国。他没有,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洋务派官僚只是“盗取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②,只是利用西方的一些“技术”皮毛,以维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根本无意于谋求真正的近代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精神,同他的爱国改良主义之间的原则分歧,他始终茫然不知。因此,他虽忠心耿耿地为洋务派奔走数十年,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中国不仅未臻于富强之境,反而每下愈况。

不过容闳为洋务运动所付出的辛劳,也还不是毫无成效。中国毕竟在崎岖坎坷的道路上,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目标,迈开了艰辛的步伐。这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容闳的努力有关的。他向洋务派提出的几个建设性方案,以及这些方案的某些成果和影响,都可证。

《机械化计划》,是容闳向洋务派所提的第一个近代化方案。

1863年,清王朝借洋兵助剿^③的“中兴大业”,即将告成。曾国藩为永保封建地主阶级的既得权益,正在集中国内著名科技家的智慧,大办洋务。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他计划中的一大筹建项目。他以筹建“西式机器厂”(兵工厂)为名,要向欧、美购买大批设备,来装备这个新的“机器厂”。容闳是当时唯一精通外洋事务的美国大学毕业生,受到了以崇洋媚外为荣的大官僚曾国藩的垂青。曾国藩决定把购买外洋机器的任务,交容闳去执行。容闳想利用时机,实行他的计划,便将计就计,专从“机器”着眼,提出了一个建设中国“机械化体系”的方案,企图借此为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开辟道路。他的《计划》指出,“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指制造杀人枪炮)。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它,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乃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然后乃可发生多数之子厂。既有多数子厂,乃复并而为一,通力合作。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他又特别强调,“予所注意之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

这是容闳要求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基本建设蓝图。首先建立一个生产机械化体

①李善兰等科技家,都为洋务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②严复语,见《救亡决论》。

③指清政府勾结英、法等侵略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等革命力量而言。

系，做为国家富强的基础，既可利用本国资源，发展工业，又可借以挽回已丧失的利权。他主张农具、钟表等等生产的和日用的工具，都应当实行机械化制造，不赞成单纯制造武器的观点，目的在于抵制外国商品的不断流入，大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封建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当时，他的方案只能是一个美妙的乌托邦，根本不为曾国藩所重视，容闳只被授予一个单纯购买外洋装备兵工厂机器的任务，做为对他“机械化”方案的回答。他的《方案》则被束之高阁，久久无人过问。

容闳出洋购买机器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从而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兵工厂，即江南制造总局在1865——1867年的全部建成。此局还附设“兵工学校”，专门培养本国工程技术人员；又附设翻译馆，广延中外科技家，翻译西方声、光、电、化、天算、舆地等科技专书，引进西方科技成就，以改进中国的生产技术。广方言馆^①也改隶于该馆，为翻译和出使储备人才。这些属于近代化范畴的措施，几乎都是在容闳建议下，由曾国藩、李鸿章等“达官”奏明清政府实行的。所以他的全盘“机械化”设计虽被弃置，他也聊感欣慰。他认为他考虑已久的改良中国的“教育计划”，总算“小试其锋”，而且“略著成效”。他决定再接再厉，为实现“教育计划”而奋斗。

1868年，容闳向洋务派“达官”们提出了又一个中国近代化的方案，即所谓《教育计划》。这个方案包括四项内容。第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欲巩固公司之地位，并谋其营业之发达，拟请政府每年拨款若干以津贴之”。第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实即留美），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年幼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第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矿产既经开采，则必兼讲运输之便利。凡由内地各处以达通商各口岸，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故直接以提倡开采矿产，即间接以提倡铁路事业也”。第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盖今日外人势力之放恣，已渐有入中国越俎代谋之象。……教徒还有民刑诉讼事件，竟由教会自由裁判，不经中国法庭讯理，是我自有之主权，已于法律上夺去一部分也。……故政府当设法禁止。以后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

这是一个更加具体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纲领。虽然容闳主观上但求第二项建议之得以实现，实质上则既强调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必要，又强烈提出了保卫主权的反教会干涉内政的正义要求，实属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和民族独立所必需。第四项建议，尤其符合广大群众的愿望，具有显著的进步性。

这个方案的全部设想，都饱和着追求自力更生、实行近代化的爱国思想，并给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艰难地出现的轮船、铁路、工矿、新式海陆军、派遣留学生等资本主义

^①李鸿章1863年所设立的上海同文馆。

性质的新事物以直接间接的积极影响。

1870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将容闳方案的第二项、即《教育计划》,写成专折,奏请清政府准照施行。1872年,容闳以清政府正式委任为留美学生副监督的身份,全力开始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工作。依原定计划,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共派学生一百二十名的任务。中国近代史上官方正式派青年出国留学的纪元,自此开始。

1874年,容闳负责修建的留学事务所落成,办公有了固定地址。学生也同时分别进入各类专门学校学习。学生中没有一个贵胄子弟。除从第二批起开始有少数买办富商子女,自费随同官学生赴美留学外,^①大都出身清贫,勤俭好学,品行端正,成绩优良,不乏可造之才。容闳把中国文明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决心为造就他们而献身。

如何对待西方新事物的争论,始终贯串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清统治集团中。疾洋如仇,是恪守封建主义教条的顽固派的一贯立场。留学事业,尤其使他们深恶痛绝。容闳依西方教育制度管理留学生的工作方法,常常被加以废弃“中学”、引导学生走入歧途等等莫须有罪名,受到恶意的中伤和破坏,连担任留学生正监督的几任官员,也都是这类败事有余的顽固派。1881年,清政府终于在顽固势力的怂恿下,下令撤回了全部留美生,解散了留学事务所,把容闳手创的为国家培育人才的新事业,扼杀在摇篮之中。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容闳的《教育计划》虽然流产,但他毕竟给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不同于封建主义书蠹的“可用之才”。回国留学生被安排在各个洋务“新政”部门里,尽管大多用非所学,却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无形中播下了一些通向近代化渠道的种子。少数人,后来还“列身显要,名重一时”。而像詹天佑这位中国铁路工程之父,更不但是旧中国近代化建设的杰出专家,而且是誉满国际、维护中华民族尊严的卓越战士。这些自然都会使容闳失望之余,引为莫大的宽慰。

不仅如此,后来清政府甚至把派遣留学生定为国策,作为挽救腐朽封建统治的一种手段。爱国青年,也把留学当做寻求救国真理的重要途径,纷纷泛海远游。出国留学,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留学生良莠不齐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引进外国先进学说和经验,涌现大批包括学者、专家、革命家在内的出色人才,促进中国近代化步伐的可喜硕果,却又必须归功于留学的活动。饮食思源,容闳当年披荆斩棘之功,自然应受到称颂。

六

容闳依靠洋务派实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随着《教育计划》的失败而告终。中日甲午战争强加于中国的悲惨命运,虽然曾经重新激励他幻想游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挺身而出,负责挽救民族危机,但徒劳无功。这才促使他携带根据旧计划新拟定的设立国家银行和修筑津镇铁路两项救急方案,^②参加了方兴未艾的改良主义维新运动。他

^①参阅《洋务运动》(资料)第8册,第104—116页。

^②容闳认为甲午中日战后,创建近代化金融体制,整顿财政,以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修筑天津至镇江的铁路,促进增殖财富,改善运输,以抵制泛滥成灾的洋货,是两项急待解决的迫切任务。

企图在解决救亡图存问题的同时，为近代化事业开辟新的前途。容闳同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人物，正式会师，开始并肩作战。他的北京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但日益险恶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客观形势，和改良主义本身的种种弱点，注定了容闳及其同伴们的善良愿望幻灭的命运。容闳梦寐以求的中国“新形势”，只好留待以后一代代革命者去创造。

历史不能割断。面对今日大好形势，一切先进的历史人物，都会受到尊重。当然，容闳所设想的“新形势”，不过是以美国为模式，变古老中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在他的近代化建设方案中，又从未明确提出一般改良主义者所追求的议会政治和民权主义等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他作为改良主义创始人的一大缺陷，然而这无损于他的历史功绩。对于出现于他活动中的一切错误，都应当作如是观。因为时代、阶级以及生活条件的局限，是很难突破的。现代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尚不免犯或此或彼、甚至原则性错误，但决不致以过错掩大德。对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更不能求全责备。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不可以苛求于前人”。^①

容闳为之献身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理想，根本不能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相提并论。但是谁也不否认，资本主义的某些成就，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前提。旧中国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新事物，不论如何简陋，也不能无视其微末的奠基作用。它们比起封建主义的东西来，毕竟前进了一步。因此，在多难的旧中国，这些新事物只要同反帝反封建的总利益相适应，就应当受到赞扬。容闳始终不渝地以“舍爱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②的高尚道德品质，在争取旧中国近代化的曲折道路上，作了不懈的努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理应受到怀念和景仰。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2页。

②梁启超《新大陆游记》。